

# 一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奥运会

中国: 张来明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立春,它寓意着寒冬即将散去,万物迎来复苏。冬奥会的召开,使北京成为双奥之城,使2022年的立春对于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意义。

2008年,世界陷入金融危机之时,中国与国际伙伴一起排除干扰,在北京举办了一届展示大团结的夏季奥运会,并在其后携手主要国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共同应对金融危机。14年后,北京冬奥会在世纪疫情中准时开幕,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2892名运动员,以及更多教练员、技术人员、医疗团队成员和媒体记者等共同参加这场盛会。在当前这个极为严峻而复杂的国际环境里,北京冬奥会是一届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奥运会。

这是一届充满挑战的冬奥会。与平昌冬奥会时相比,我们此刻身处一个看上去挑战更严峻的时刻。2018年的

韩国平昌,来自朝鲜与韩国的运动员共同组成的女子冰球联队参加了奥运会比赛,每当球队亮相时,观众就会打出“We are one!”(我们是一家人)的横幅。而2022年,当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凌空一跃之时,全球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迄今已有4亿人感染,577万人失去生命,疫苗鸿沟难以弥合,国际防控策略缺乏共识。同时,民粹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气候变化危机加重,责任分担相互推诿;地区热点问题有增无减,和平似乎前景暗淡。

这是一届世界迫切需要的冬奥会。正如《纽约时报》2月5日刊发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一届分裂的赛事中寻求团结》所言,“无论在何种背景下,奥运会都始终代表着一个展现共同人性和体育成就的盛大节日。在一个极化的世界里,罕有能把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场合。”或许正是在当前这样的时刻,我们格

外需要一届成功的冬奥会,给处于灰暗中的人们带来希望,展示人类的共同追求和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形成共识,反对用政治绑架奥林匹克运动,因为任何形式的所谓抵制,最终伤害的是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和一场标志着人类共同精神的聚会。

这是一届展示人类团结的冬奥会。正如8个月前闭幕的东京奥运会一样,我们试图用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展现人类在逆境面前的团结和不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讲话中说:“竞争激烈的对手也能够和平共处、彼此尊重。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使命,让人们在和平竞争之中团结一心。”在冬奥会的赛场上,体育就是唯一的语言,在单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最终获得亚军和季军的美选手马里诺和澳大利亚选手科迪在新西兰选手辛诺特完成夺冠一跳后与她唱又跳尽情庆祝;在冰壶

混双循环赛中,中国运动员向刚刚击败他们的美国运动员送上“冰墩墩”奥运纪念徽章,并受到美国运动员的热情感谢和回礼。乔治·奥威尔曾说,“体育等于战争减去开枪”,但看到身披国旗的运动员们站在北京冬奥会领奖台上互相拥抱,真诚地向彼此道贺,我们相信,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外,“更团结”的确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应有之义,这种精神也应当延伸到抗击疫情、经济恢复、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化解地区热点问题等诸多领域。

这是一届弘扬人类文明的冬奥会。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联合国大会第76届会议主席沙希德说:“奥运会代表了人类最好的一面,人们聚集在一起竞争,谦虚地接受胜利,优雅地接受失败。”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4世纪,希腊各城邦最优秀的运动员聚集在奥林匹亚,在阳光之下进行力与美的较量,也由此促成了奥林匹克休战的诞生。奥运会代表和平与荣誉,代表超越

自我、团队合作、公平竞争、尊重规则、尊重对手的运动家精神,这些人类文明最精华的特质也将是让我们继续走向共同未来的基础。

这是一届中国人民表达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真诚愿望的冬奥会。北京夏季、冬季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更多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而到了2022年,则是更多地去阐述人类共通的情感,是从“我”转向“我们”。在疫情中,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为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一直采取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为在向世界奉献一场精彩冬奥会的同时不发生灾难性的疫情扩散,北京冬奥组委工作人员、众多志愿者以及2200万北京市民和410多万张家口居民乃至全体中国人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努力为一场全人类的盛宴搭建舞台,用体育这一共同的语言尽力弥合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鸿沟。

在面对逆境时展现人类精神,在疫情、气候变化和地区冲突等多重挑战面前提振全世界人民的信心,是这届冬奥会迥乎不同的意义。人们说,世纪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都是大考,但无论是传染病这样的自然灾害,还是世界大战这样的人为灾难,这样的考验人类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千考万考,考的是人类能否战胜自身弱点,共同走向光明的未来。我们这一代人在读到过去战争与苦难的历史时质问我们的先辈,为什么在人类的痛苦面前没有携起手来制止。那么今天,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我们是抛下成见与算计,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而奋斗,还是沉湎于一时的相对得失,在他国奋力拼搏时袖手旁观甚至坐收渔利呢?我们的子孙会用他们的笔墨拷问我们今天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 亚细安冬奥之旅更团结 ■ 李叶明 许倩

北京冬奥会在美国发起“外交抵制”声中成功举办。除了少数美国盟友和几个欧洲小国跟随,参与了所谓的“外交抵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响应美国的这一做法。

这被认为是美国影响力的衰退。尤其是中南美洲、太平洋岛国、中东以及东南亚,向来被认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何况在这些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何况这些地区,地处热带,当地没有冰雪季节,也无从开展冰雪运动,所以很多国家从未参加过冬奥会,表态“外交抵制”其实不难,因为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等于是送个“顺水人情”。

例如东南亚,原本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参与冬奥会。马来西亚首次有选手获得冬奥会参赛资格,是在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生于吉隆坡的茹白杰,获得花样滑冰参赛资格。另一位选手杰弗里·韦伯,父亲是美国人,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了高山滑雪项目。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也是在上届冬奥会时才首次有选手参赛。为新加坡创造历史的是18岁小将吴琪雅,她获得冬奥短道速滑项目的参赛资格。只可惜她这次并没有拿到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

上次除新马两国,还有菲律宾、泰国、东帝汶参与了平昌冬奥会。亚细安还有六个国家没有参赛。尤其是亚细安最大国印尼,至今从未参与冬奥会,仿佛是冬奥“绝缘”的国家。

亚细安又称东南亚国家联盟(在中国简称东盟),最早是冷战期间由立场反共的五个国家:泰、马、菲、印、新,于1967年发起成立。当时,美国正在打越战。所以亚细安五国自然成了美国的冷战盟友。

冷战结束后,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分别于1995年-1999年陆续加入;加上早前加入的文莱,亚细安扩大为十个国家。东帝汶独立后也成为亚细安的观察员国。可以说,亚细安五国是在冷战中诞生,而亚细安十国却是冷战结束后的产物。

因此,当“新冷战”阴云再起时,自然会有一种担心,亚细安是否会被分化?其实六年前的南海仲裁案时,亚细安就曾面对挑战。当时亚细安会议首次无法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指责中国在分裂亚细安。但事实

上,中美对抗才是令亚细安面对分化的真正外力。

如今中美博弈加剧,这一分化亚细安的外力再度加码。不过,亚细安已经意识到问题,多个国家在特朗普后期就纷纷表示,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致力于维护内部团结。

自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并没有改变与中国对抗的姿态,而是采取了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该对抗的对抗——三合一的所谓“竞抗合”策略。而亚细安再次成为美国的重点争取对象,成为其推行印太战略的重点地区。因此,对于美国带头的,针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也给亚细安国家带来了如何表态的压力。

但很显然,面对这一课题可能带来的分化,亚细安国家做出了务实的选择,保持了内部的团结。

首先,凡是有选手参赛的国家,官方都已做出积极表态。这次泰国有4名选手参赛,马来西亚也有2人,菲律宾有1人,东帝汶和柬埔寨也有选手参赛,其中柬埔寨是首度参赛。这些国家都表态反对将体育“政治化”。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泰国皇室诗琳通公主,出席了冬奥会开幕式。

没有选手参赛的越南和老挝,都由官方出面肯定了北京为举办冬奥会所做的努力。老挝政府还表示,珍视体育事业对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贡献,坚信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北京冬奥将有力促进国际和平、发展、友谊,以及相互理解与包容。

印尼作为亚细安最大国,虽然从未参与冬奥会,但印尼曾参与申办2032年夏季奥运会,希望成为首个举办奥运会的东南亚国家,当时得到北京的支持。投桃报李,印尼也不会参与“外交抵制”。而佐科总统在今年一月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时,还预祝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所以这一次,没有一个亚细安国家跟随表态“外交抵制”,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在冬奥会问题上,亚细安国家保持了团结,并选择支持奥运精神——支持“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作者简介:李叶明,新加坡二战研究中心) 许倩,中国河北师范大学印尼研究中心)

## 激进主义为何如此嚣张?



本报评论员:余凡

最近一个月来,国内反政府的激进言论、恐怖主义纷纷扰扰。1月19日,自称“资深记者”的艾迪(Edy Mulyadi)发表反对新首都(IKN)的议论时,暗喻加里曼丹是“精灵(JIN)抛弃孩子的地方”及侮辱性言辞。因被东加省民众控告,已遭警察依法逮捕调查。

27日,尼果(NS)为声援艾迪,竟指责加里曼丹人:“当女人被卖到X国成为性奴隶,不少儿童溺死于废弃的矿坑,你们都不发一声。但当有人只说了‘精灵抛弃孩子的地方’,你们马上请愿。你们究竟是谁?”西加省的达雅族(DAD)组织已将他告上省警察厅。

讲经师苏吉努尔(Sugi Nur R)31日在中爪哇省巴加马斯(Banyumas)发表“圣战经济”的反政府言论。但半场就被当地 Banser 团体截断并解散。而“KUHAP APA”新组团体,故意把都东(Dudung)将军内部讲话时的“上帝不是阿拉伯人”曲解,而告上陆军宪兵总部。

马达拉一些人挂起里捷西合(HRS)及“阵线卫士”画像的“海报”,大书“彻查KM 50悲剧中对6位阵线卫士的屠杀”。“212兄弟会”副书记诺菲尔(NB)吹嘘:“因为HRS是真正维护国家、宗教及印尼民众免于亵渎神明,外国势力殖民、邪教外道及世俗主义、多元主义及自由主义的侵袭。”“多年来,HRS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社媒活动家赫尔米(Helmi F.)说:“是否处理KM 50命案时有错误,或者这原本就是设置好的恶性?”

《罗盘网》于5日称,肃贪局

前任局长布西罗(Busyro Muqoddas)与44名各界人士组成反迁都及在东加省兴建新首都努山达拉(Pal Merah)的请愿团。国家警察总部安全情报局(Baintelkam)计划对全国清真寺进行数据规划,以免恐激思想传播,竟被前高官居心叵测地反对。

中爪哇省普沃勒若县(Purworejo)伯纳尔(Bener)水库土地及采石发生争议,YLBHI法律援助片报道:“上千名治安部队已在伯纳尔区警察局后院集合,全副武装,还带着盾牌和警犬。”哇达斯特村昨夜停电,那儿的友人因信号被干扰而难于发送消息。“非政府组织(LSM)及‘社会公正斗士’(SIJW),大肆炒作,颠覆事实,显然幕后有人操纵。”

曾贵为前“阵线”领导人HRS发言人,有旧势力支持的政客海卡尔(Haikal H),之前以“讲师”身份在布道中扭曲历史,玷污“国父”朋加诺的名声,已被REPDEM告到警察局。宗教教师卡立特(KB)以激进、“不宽容”闻名,最近,社交媒体上热传其视频引导信众:“既然已皈依宗教,光影就应该被销毁!”引发了影戏艺术家及智者的反对声浪。

媒体16日刊载甘达(Ganda S)的文章称,另一个白痴“沙漠斯”、外国代理人及国内旧势力的勾结,经历一连串动作后,如今自称是“98活动家”的阿贡(Agun WW)的狂热分子公然在视频上高喊解散共和NKRI,要建立“哈里发”伊斯兰国。他在国际外交规则、经济建设、社会福利吹嘘空洞的海市蜃楼,还狂妄而愚蠢地挑战佐科总统的建国方略。

雅加达FIN.CO.ID网媒17日报道,激进派29岁讲经师惹发尔(Jafar SA)于2019年底的33秒讲话视频被网民挖出,他嚣张地号召信众们拿起武器,推翻佐科总

统的合法政府,在场的信徒歇斯底里的呼应着。惹发尔曾于2019年底因辱骂副总统马鲁阿敏为“X”被警方扣押调查,不久因“不逃跑、不销毁证据、随时接受调查”而被释放。看过视频的网民纷纷留言,惹发尔狂热言论已属“图谋叛国”,警方应该尽快采取行动!别再让某些政客或民间团体以宗教的外衣为掩饰,发表激进言论,甚至鼓励恐怖暴力的叛乱。

反恐特警部队(Densus88)于10日在朋古鲁省(Bengkulu)逮捕CA、M及R三名涉嫌恐怖主义人士,他们都是印尼当前伊斯兰团体的成员,让舆论沸腾。14日,来自苏西省的EP计划在廖省甘巴儿县(Kampar)发动恐怖袭击被抓。特警同日在中爪哇省逮捕RAB、AJ为首的4名嫌犯,在中爪哇省当县(Batang)逮捕MF及NR,也都是涉嫌恐暴。他们有的是政党、协会理事,长老或讲师;证明恐怖主义的渗透无孔不入,国安形势已经不容忽视。

政论员卢迪(RudiSKamri)在其“民族儿女渠道”(KAB)发表视频谈话,他认为在这些反政府、暴力、反华、恐共的言论及活动背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有国外激进势力及国内“政阀”、旧势力的黑手,要摧毁佐科总统“富国利民”的长远战略。国家执法部门必须依法公正严办。尤其是法官,别在“压力”下作出轻判,而姑息养奸、遗祸子孙。

《罗盘网》于16日报道,国家警察总长希吉特(Listyo Sigit P)将军在巴厘岛召开的反恐特警高层会议中宣布:“反恐特警部队现有警力3701名,我们将增加双倍警力。”广受各界好评,多数民众深信政府的决心与能力;反对者的嚣张,只是心虚胆怯的表现!



加纳斯著《巴达维的好汉詹邦》

随着周边地区的种植园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中国人。有些被东印度公司抓去当奴隶,也有的成了工匠,靠各类技艺维生,慢慢地做生意的华人越来越多。在丹格朗,塞尔蓬地区,自17世纪以

## 漫画与身份认同——加纳斯(张朝山)(6)

瑟诺·古米拉·阿吉达尔玛(SENOR GUMIRA AJIDARMA)

来,中国人不断涌入,不少人在东印度公司允许的范围内经商贸易,但垄断权依然掌握在东印度公司手上。直至今日仍能听到像“文登华人”(Cina Benteng)这样对华族居民的称呼,这一点既与历史记载相一致,也能说明加纳斯的《芝沙丹尼》中的巴·格隆冬这样的人物存在的合理性。

必须承认的是,雅克·斯派克斯总督(Jacques Speex, 1629-1632)为巴达维亚的华人经商提供了有利的经商条件,聪明能干的华人也善于把握机会,生意自然越做越大。可以说除了不能享受政治权利,华人已然成为巴达维亚居民,直到有一天突然

被视为眼中钉,并于1740年遭遇大屠杀。随着经济日益繁荣,巴达维亚的华人数量迅速增加。但是,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贪婪造成生态灾害,引发失业潮。

华人获得了在周边地区砍伐森林、开垦土地的好机会。很快甘蔗种植业包括糖厂得以蓬勃发展,并能满足全球市场需求。从1680年至1720年,不仅土地开始贫瘠,糖厂制糖用的柴火也越发稀缺。东印度公司随后改变政策,实行配额制,不再鼓励种植,并降低采购价。整个17、18世纪,东印度公司对胡椒和其他香料、咖啡、藍藍等农产品均采取上述严控措施。

由于土地和配额问题恶化,亚洲市场份额有一定的下降,以及西印度生产的食糖价格更便宜,东印度公司农产品无法在欧洲市场竞争,这一严控措施才被取消。1740年大规模屠杀华人事件经常被简单地解读为东印度公司覬覦华人掌控的商业而痛下杀手。然而,真正的问题显然更加复杂,现阐述如下:

1、殖民政政府给巴达维亚的每一个族群都委派了一名事务长官,专门负责管理与东印度公司有关的一切事务。那时,华人群体的事务官是连富光(Ni Hoe Kong),官衔是甲必丹。这样做的目的是东印度公司不希望卷入

不同族群内部复杂的事务和矛盾当中。

2、自1650年以来,当建设好城市堡垒,政府就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原住民安置在堡垒外的周边地区,称作“周围地区”(Ommelanden)。对华人群体采取不一样的政策。原住民事务官受荷兰土著(原住民)事务专员管辖。城内的华人居民只由华人甲必丹管辖,华人甲必丹的权力也只限于华人区。此政策管辖混乱,即使受荷兰事务专员管辖,原住民区与殖民政府沟通困难混乱的情况时有发生,更不用说事务官独立管辖的华人区。事务官最初都是由种植园经理担任,被叫做“波西亚”。实际上只有在向政府上缴赋税时波西亚才真正扮演起联络政府的事务官的角

色。但随着糖厂倒闭,工人下岗,经理这个岗位也就不复存在了。

3、由于裙带关系、贪腐、权责不分、官商勾结等弊端滋生,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体系已是日益腐朽。比如负责华人移民事务的两位主要官员,总督阿德里亚·法根尼(Adriaan Valckenier)和东印度政府委员会高级官员古斯塔夫·威廉海姆·巴隆·冯·伊姆霍夫(Raad van Indie Gustaaf Wilhelm Baron von Imhoff)就经常互相推诿责任,针锋相对。这种混乱的殖民管理体系产生了致命后果,更不用说周边地区发生超出华人事务官职责范围的问题,城内的华人居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